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促进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作贡献



图为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运抵加纳时，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相关人员与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代表合影。新华社记者 许正摄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时间已经走到2022年年中，新冠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仍在给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冲击。值此人类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会人士及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并称赞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促进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抗疫合作引领了方向，注入了希望。

彰显大国担当

国际社会关注到，两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呼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宣示和传递着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心，及时同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为打好全球防疫阻击战提供中国方案。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的合力，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胸怀和历史担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止一次称赞说，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国际社会树立了

良好典范，彰显出大国担当。

“中国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榜样。”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阿德希尔说。

阿德希尔还指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走在前列，毫不保留地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各国控制疫情。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非洲地区应对疫情的能力。“中方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承诺很多涉及非洲，这些承诺两年来一一落地，给非洲人民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伊朱认为，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携手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当务之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及中方的实际行动契合当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反映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决心。

“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期待未来非中双方在卫生健康等领域开拓新合作空间。”奥努伊朱说。

巴基斯坦《每日快报》专栏作家阿斯拉姆·汗认为，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之际，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称赞中方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作贡献，并指出中国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并对外援助疫苗等抗疫物资，为这些国家抗疫提供了

宝贵支持。

注入中国动力

多国媒体注意到，中方在多个外交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持续注入中国动力。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目前，中国已向20多个国家转让技术，合作生产疫苗，在海外已经形成了10亿剂的生产能力，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国疫苗，多国制造，服务全球”的生产网络。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方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世界经济论坛“塑造健康和医疗保健的未来平台”负责人希亚姆·比申接受采访时说，实现世界卫生健康公平极为重要。新冠大流行期间，实现疫苗公平与实现卫生健康公平密切相关。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帮助了许多国家。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推进疫苗国际合作，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作出了表率。

菲律宾时事评论员张兴万说，中国向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助力菲方尽快控制疫情并重启经济。中国一直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作出贡献。“中国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助力全球共同抗疫”。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爱德华多·雷加拉多称赞中方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作的不懈努力。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及时向他国提供抗疫物资，有力推动抗疫合作，助力消除“免疫鸿沟”，为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作出贡献。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莱斯称赞中国的承诺和决定，认为中国以开放的态度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为推动疫苗国际合作作出巨大努力，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中国向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援助疫苗，为全球抗疫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主席、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尼尔·阿克拉克姆说。

推动全球合作

国际社会注意到一组数字：截至2022年5月上旬，中国累计向153个国家和115个国际组织提供了46亿件防护服、180亿份检测试剂、4300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资。多国人士认为，中国始终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团结合作抗击新冠疫情贡献巨大力量，为推动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盖·卢科宁指出，中国有资源也有意愿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但仅靠中国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中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世界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共同改善全球卫生治理，这对解决全球性问题非常重要。

埃塞俄比亚的斯尼亚巴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认为，中国研发制造的新冠疫苗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中方正在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指出，中方倡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非常重要。

“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中国创新、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将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傅晓岚说。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路易斯·德尔加多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为全球合作抗击疫情作出重大贡献，也为推动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政策顾问穆罕默德·汗说，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为维护全球人民的健康福祉始终在贡献自己的力量，世界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矢志不渝的合作精神和大爱情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中方将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环球观察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在接连发生导致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后，美国各界要求收紧枪支管控以及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呼声高涨。然而，强大的舆论压力也抵挡不住维护党派利益的“惯性”。时至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仍然未能通过旨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法案，控枪法案也难以突破利益集团的围堵堵截与党派博弈的藩篱。

目前，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以枪支制造商、枪支文化传播者、拥枪权坚定支持者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枪支利益集团，影响力遍及全美各个领域。美国司法部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美国枪械制造商总计生产逾1.39亿支枪，投放民用市场，仅2020年一年就投放1130万支。作为众多倡导拥枪权组织中的“龙头老大”，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是美国实力最强的游说集团，共和党保守派在美国内各级立法机构、政府监管部门和政治新生代的成员均成为其“俘获对象”。

在枪支利益集团的绑架下，美国已超过20年未通过重要控枪法律。据《华盛顿邮报》披露，2019年，在美国多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后，共和党政府曾考虑与民主党合作推动控枪立法，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接连向白宫打去几十通电话，共和党核心推动控枪者将其支持率，遂放弃了这一想法。美国现任政府在控枪议题上同样雷声大雨点小，直到今年4月才出台控枪“幽灵枪”的新规。即使这样一纸行政规定，也遭到了共和党人批评，一些拥枪组织甚至表示将对新规提起诉讼。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当前的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国际社会对美国控枪前景表示怀疑。有媒体表示，在政客消极作为、社会撕裂加剧等因素影响下，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未来多半会在美国重演，人们在震惊与悲痛过后，除了陷入无助与无奈，别无他法。

今年3月25日，枪击案幸存者华盛顿正对美国国会大厦的一块草坪上放置了1100余个黑色裹尸袋。每个裹尸袋代表150人，合计约17万人，即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高中枪击事件以来美国因枪击暴力丧生人数的总和。从高处看，它们组成英文短语“思念和祈祷”，以讽刺美国政客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例行公事的表态。

国际舆论指出，金钱政治将政客与利益集团捆绑，政客在控枪问题上相互攻击、相互掣肘，民众却在付出生命代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国家瘫痪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个枪击说集团以及一个没有任何行动意愿的政党。”

美国教育部长米歇尔·卡多纳发表声明说，校园枪击是每个家长最大的恐惧、最恐怖的噩梦。他对国会缺乏通过立法保护儿童的意愿感到愤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种族歧视是最大的不公。美国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人权赤字最严重的国家，但令人不可接受的是，过去数十年，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在解决上述问题上采取任何实质举措。

更让国际社会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美国自身人权问题如此严重，还到处对别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把美国人民的人权放在心上，尽快向世界提交一份美国的人权报告，深刻检讨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为什么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是其他31个高收入国家总和的15倍？”汪文斌表示。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一声枪响击碎了美国所谓“人人得享不可剥夺的生存与自由”的人权幻象。枪支暴力与新冠疫情一样，已经成为盘踞在美国人民头上的死亡幽灵，时刻威胁着美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控枪难已然撕破“美式人权”的虚假面具。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枪支暴力问题，这才是捍卫人权的正事！

控枪难撕破『美式人权』虚假面具

日本福岛癌症患者诉东电公司案一审开庭

将对今后同类诉讼产生较大影响

□ 本报记者 苏宁

5月底，深受福岛核事故影响的日本福岛县6名甲状腺癌患者向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原告方称，东电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导致自身罹患甲状腺癌，要求东电公司赔偿6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50万元）。

福岛核事故之后，福岛地区甲状腺癌发病率大大超出正常数值。然而，围绕甲状腺癌发病率与核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存在不同观点。国际社会认为，本次诉讼系首例福岛核事故受害者因健康原因向东电公司索赔的案件，法院是否认定甲状腺癌与核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将对今后的同类诉讼产生较大影响。

原告当庭哭诉病情

据日本媒体报道，提起诉讼的6名原告年龄在17岁至28岁，此前都是福岛县居民。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时，他们的年龄仅为6岁至17岁。原告律师团首席律师井户谦一在记者会上介绍了6名原告的首席病情。6人中，4人摘除了全部甲状腺，2人摘除了一半甲状腺。如果甲状腺被全部摘除，就必须接受痛苦的放疗并且需要终身服用激素。6人有的已经接受了4次手术，有的可能已经发生了癌细胞转移。

在5月26日的一审庭审中，原告方出庭作证的一位20多岁女性哭诉称，地震当天她正参加中学毕业典礼，之后在福岛县健康调查中发现罹患癌症。接受手术治疗后，她不得不放弃了东京的大学，就读附近的大学，然而癌症还是复发了，不得不从大学退学接受放疗，目前病情不见好转，甚至持续恶化。除这名女性



图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反应堆。新华社发

原告外，另有3名原告也到庭，一边哭泣一边参加了庭审。

井户谦一表示，6名原告不但遭受着癌症病痛的折磨，而且还不得不为今后的人生感到担忧。6人均处于20岁上下的人生黄金时期，然而他们的求学与就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还对将来的结婚、生育感到不安。

更加令人心痛的是，有人竟称他们是“福岛声誉的破坏者”，认为他们对福岛的复兴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6人不得不在生活中隐忍不言，此次参加诉讼也是躲在屏风之后，避免公开露面。

尽管受到舆论质疑的压力，但原告方仍在法庭上表示“希望了解自己是如何患病的，许多比自己

年纪小很多的孩子也得了癌症，希望诉讼能够帮到这些孩子”。

原告方律师团指出，福岛县对核事故发生时年龄在18岁以下的约38万人进行筛查后，已发现近300名甲状腺癌患者。他们呼吁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发声，希望诉讼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

“日本原子弹受害者持有健康手册，享受终身免费医疗及补贴，政府也应对核事故受害者制定相应的援助机制。”井户谦一谈到。

因果关系成为焦点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福岛核事故与原告罹患

癌症有无因果关系成为此次庭审的关键点。

原告方主张，儿童及青少年罹患甲状腺癌的最大发病原因是受放射线照射，正常情况下100万人中每年只有1至2例，发病率极低。但是福岛核事故之后，福岛县38万儿童、青少年中发现包括原告6人在内的293人发病，发病率达到正常数值的数十倍，核辐射与罹患癌症的因果关系由此已得到充分证明。

对此，被告方东电公司方面在答辩书中称，原告“并未受到核辐射”，即使受了核辐射“也未达到影响健康的程度”。

关于核事故与福岛县甲状腺癌多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各方意见难以统一。

今年3月，日本NPO法人“3·11甲状腺癌儿童基金”公布数据称，福岛县患癌症的儿童二次手术比率正在上升，而且年龄越小，进行二次手术的比率越高。该基金代表理事崎山比早子指出，有10多岁的儿童在经过随访后被摘除了全部甲状腺，那些说福岛县“高精度筛查导致病例增加”的观点并无根据。

日本政界高层中也有声音认为，核辐射与罹患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今年2月，小泉纯一郎等5名日本前首相曾就此问题向日本环境大臣山口发出公开书面质询，并对后者持“儿童甲状腺癌与放射线影响无关”的立场提出质疑。

但日本国内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福岛县专家会议虽然承认甲状腺癌发病率超出日本正常数值数十倍，但仍表示现阶段尚不能确定罹患癌症与放射线辐射之间的关联性；福岛县健康调查评价部认为，存在核事故发生后未能及时禁止的部分受核污染食品流出导致核辐射受害等情况，但不承认甲状腺癌发病与环境核辐射有关。

针对上述观点的尖锐对立，日本《科学》杂志刊发

的《核电站事故与儿童甲状腺癌》卷首语谈到，“对专业人士而言，就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开展因果关系的科学论证是极其罕见的”。

审理或将旷日持久

有分析认为，当前日本政府及福岛县地方政府都不认可罹患甲状腺癌与核辐射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方取得法院支持并胜诉的难度很大。原告方律师团也承认，庭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事实上，受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大地震及海啸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4号机组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迄今为止，已有至少上万名原告发起30起诉讼，向东电索赔。

涉及福岛核事故赔偿的诉讼都经历了漫长艰辛的过程。针对受灾赔偿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下设的原子力损害赔偿纷争审查会制定了所谓的“赔偿标准”，但因该标准设定过低，受灾民众与东电公司在较长时间都无法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截至目前，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对事故灾民的赔偿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

由福岛受灾民众发起的集体诉讼案件约30起，据《朝日新闻》报道，截至今年3月，在全部约30起集体诉讼中，经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裁定的只有6起。此外，集体诉讼涉及国家赔偿的部分，要到今年夏天才能得到统一判决。

目前，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11年，至今还有超过3万名受灾民众在外地避难。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避难民众正在忍受着背井离乡、亲人分离的痛苦，受核辐射影响的核事故受害者更要遭受病痛的折磨，不应再让他们遭受等待司法判决的煎熬。日本司法机关应该本着保护和救助受灾民众的原则，尽快推动司法审判并作出公正判决。